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写作·恋爱·生活——司汤达和《红与黑》

## 内 容 提 要

司汤达是法国十九世纪伟大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有着丰富而曲折的生活经历，给人们留下了《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本书从青年文学爱好者的特点和需要出发，介绍了司汤达人生的主要经历和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着重介绍”分析了其代表作《红与黑》，同时兼顾其他作品。本书结构自然，语言朴实明快，读后不但可增进您对司汤达及其作品的了解和认识，而且还有助于提高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和鉴赏能力。

##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哥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 格勒诺布尔的小公民

格勒诺布尔是司汤达的出生地。这是法国东南部一座美丽的城市，蜿蜒曲折的伊泽尔河穿过鲜花浓艳而茂密的土地。隔着阿尔卑斯山与意大利著名的城市都灵遥遥相对。然而，家乡留给司汤达的并非全是美好的记忆。其中有着许多烦恼和酸楚。司汤达在成长中，一直试图远远离开这座城市，去寻找自由的人生。他在日记和自传里，也时不时流露出对家乡观念的淡漠。在司汤达父亲的眼里，这个不肖之子一直是个小叛逆的形象。为什么会这样？读了这一章的内容，就会有一些了解。

司汤达的父亲叫谢吕宾·贝尔，他是一个富裕家族的唯一儿子，继承了一笔将近二十万法郎的财产。因为尚有九个姐妹需要他的照顾，所以他到1781年三十五岁上才结婚，新娘是格勒诺布尔城最出色的医生甘尼永的女儿，名叫昂里埃特·甘尼永。1783年1月23日，这对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亨利·贝尔，这就是后来的法国大文豪司汤达。

亨利·贝尔从小就是个聪明而又勇敢的孩子，自然也就很顽皮。刚会走路的时候，他有一次用一根尖尖的棍子刺痛了一头骡子，小胸脯立刻被踢了一下。假如那头骡子脚再重一点。我们就不会看到《红与黑》了。亨利·贝尔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在他和两个妹妹的眼里，母亲是全家快乐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家里就有一种愉快的忙碌。母亲热情善良而且好客。她经常邀请朋友们到家里用餐。每次请客，她总是用许多蜡烛将客厅和餐厅照得通明。贝尔的母亲还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她喜爱绘画，还能阅读意大利文版的但丁的著作。不幸的是，在贝尔未满八周岁时他所热爱的母亲就在一次痛苦的分娩中死去了，贝尔无忧的童年就这样过早地结束了。

随着母亲的死亡，整个家庭陷入阴郁之中。贝尔的父亲是个律师，思想保守，信仰宗教。他对当时法国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充满了仇恨。母亲死后，父亲续弦，娶了贝尔的姨妈塞拉菲。塞拉菲姨妈虽然与贝尔的母亲是同胞姐妹，但性格迥异，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质，一脸严肃刻板的表情，而且同父亲一样思想保守。在塞拉菲姨妈管束下，贝尔多半是被关在屋子里，形同孤儿。即使外出也总有人监督。他和两个妹妹时时被告知，不能和“普通人害的孩子”一起玩。那时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每天中午可以到外祖父老甘尼永家去吃午饭。从贝尔家到甘尼永家，他们有五分钟左右的自由漫步时间。在外祖父家可以眺望伊泽尔河、广阔的街道和市中心广场。然而好景不长，下午他们又要回到贝尔家那阴暗的，缺乏欢乐的房间里去做枯燥的功课。

亨利贝尔十一岁时，家里决定送他到本市的一位叫勒鲁瓦的画家那里学绘画，这使他非常高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找到了一个享受自由的机会。他利用上课之余，一个人跑到中心市场去饱眼福，或者到公园去玩耍。后来事情终于败露。他追求身心自由的一束微光很快被一个新的决定扑灭了。他的绘画老师被请到家里来上课了。

还有一个令贝尔讨厌的人是雷拉纳神父，他是耶稣会的教士，是父亲请来的家庭教师。在他的管教下，小贝尔接受着彻底的宗教教育。作为一种职责，神父要向学生的家长汇报学生所有细小的过失。于是小贝尔就会不断地受到某种应有的惩罚。神父的思想顽固僵化，以至司汤达后来说这位神父毒害了他的童年。那时小贝尔在外祖父的影响下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当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神父时，却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一次在上课时，神父看

见一只苍蝇落在了牛奶杯中淹死了，竟荒唐地要求贝尔以此为题用拉丁文作一首长诗。小贝尔拒绝这样做，神父便打他的手心。见小贝尔仍不屈服，神父又用“违反神父的意志，将来会永受地狱之苦”来吓唬他。但小贝尔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在乎！幸好这时外祖父甘尼永走了进来，才化解了这场冲突。然而这件事给贝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写到这里，大家自然会想到，贝尔一定很爱他的外祖父了。是的，用司汤达自己的话说，“我那杰出的外祖父……事实上是我真正的父亲与亲密的朋友”。老甘尼永也同样很疼爱自己的外孙。他对小亨利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甘尼永虽然是个医生，却非常喜爱文学，是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伏尔泰的崇拜者，他有着大量的藏书。贝尔十岁时，就常到外祖父那里去借书。当他拿了“禁”书时，宽厚的外祖父也假装没看见。所以贝尔很早就读到了莫里哀和伏尔泰等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

贝尔的童年，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是个庸碌无为、优柔寡断的君主，成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他当政十五年，国债增加了三倍，市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终于有一天，1789年7月13日，巴黎上空响起了警钟，法国人民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规模起义。人们操起短刀和斧头去夺取武器。起义者把国王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到7月14日，起义队伍攻占了封建王朝的最后堡垒——巴士底狱。处死了守卫司令，释放了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1792年，法国进一步废除了王政，实行共和。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送上了断头台。

对资产阶级革命，贝尔的父亲和姨妈还有雷拉纳神父感到不寒而栗。据司汤达本人回忆，对国王路易十六的每一阶段审判，都会引起贝尔家族的巨大忧虑。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第二天，从里昂和巴黎来的邮车到达的声响惊动了贝尔家。贝尔的父亲急忙出去看报纸，打听消息。回家时，他沮丧地对人们说：“一切都完了，他们已谋杀了他。”唯独小亨利却在内心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欢呼。对共和党人的节节胜利，他有时情不自禁地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内欢呼庆祝。贝尔家庭中这种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实际上也是当时法国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虽然当时司汤达年仅十岁，但过早地失去母亲又得不到父爱，促使他思想早熟。他由于讨厌父亲、姨妈和雷拉纳神父，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使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革命。当时他也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特别是接触到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著作。这对他早期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亨利·贝尔从小就有着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是个年幼的愤世疾俗者。有一次，他被父亲喋喋不休地向他灌输那些封建专制主义的陈词滥调惹恼了，忍无可忍地顶撞道：“如果你如此地爱我，请给我五个苏一天，并让我照我喜欢的方式生活。总之，你可以相信一件事：只要我一到足够的年龄，我就将应征入伍。”把他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后来，贝尔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 中心学校的优秀生

1796年，十三岁的贝尔注册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中心学校。这所学校设立在城市边缘耶稣会的老式建筑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这种新型的公立学校，以普及进步的思想文化教育。这样，亨利·贝尔终于从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里逃了出来，走向了新的生活。

中心学校的教师大都是些革新派。数学教师迪皮·德·博尔德据说曾经当过拿破仑的数学教师，他在教学方面给贝尔以很大的帮助。贝尔是个聪明的孩子，理解能力极强，在入学以前，他就在《百科全书》中读到过有关数学的论述，所以数学一直是贝尔引以为自豪的一门学科。直到后来到军队中供职，同僚们还对他非常佩服，说他象魔鬼一样精通数学。渐渐地，他对迪皮讲授的数学已经感到不能满足了，总觉得“吃不饱”，而且认为迪皮年纪老，观念也往往落后。他听说本市有一位叫加布里埃·格罗的青年科学家，是个教授几何与微积分的私人教师，就瞒着父亲，从姨婆伊丽莎白那里要了些钱，每天放学后就去听格罗老师讲课。

格罗老师一直是亨利·贝尔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个蓝眼睛、金色头发的强壮的青年人，浑身充满了热情、活力和自信。他是个激进的“人民公社”成员，是个纯正而无私的民主主义者。他有着出色的演讲才能。贝尔从他那里学到了数学知识，同时也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格罗老师一生清贫，没有显赫的名声。他在外省靠教书度过了一生，但他却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品格。只要他因故没能给学生们讲课，他就会拒收学生的学费。他时刻告诫他的学生们要奋力去追求“伟大与有用的东西”，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后来司汤达还把格罗的名字写进了自己的代表作品《红与黑》。他在小说中写道：“这个高尚的人只有一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年借给刚去世的主持人六百法郎，帮助他养活他的子女。”司汤达借了小说人物于连的口，来表示他对格罗先生的怀念和敬意。其时于连刚刚获得了侯爵奖赏给他的一枚十字勋章。但他却说：“可怜的格罗先生！应该得到十字勋章的是他，而得到的却是我……”。司汤达在他的自传中，还称他的这位教师为“无与伦比的格罗”。

在中心学校，贝尔并不合群。因为贝尔上学较晚，学前又受到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所以一开始就进了高班。在同学们的眼中，他是个很奇怪的孩子。粗壮的体态，一个硕大的脑袋和蓬乱的黑发，短短的腿。那时，他常穿着一件长长的、几乎拖到脚面的灰大衣，快速挪动时造成一种滑稽的印象，那些顽皮的孩子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行走塔”。由于他的孤独性格，他不仅被排除在孩子们的各种游戏之外，而且还常常遭到各种嘲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些尖刻的语言来回敬他们，这样往往要挨一顿打。但贝尔从不屈服。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发生了冲突，他象骑士那样提出要和这同学决斗。双方按约定的时间在古城门外相见，其他同学蜂拥前来凑热闹。两个决斗者各自聘请了助手，煞有介事地丈量着步距。围观的同学们兴奋地叫喊着，议论着，为双方助威打气。可是这场精彩的“决斗”终于没有发生，因为双方的家长闻讯赶来了，及时阻止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贝尔显示出自己的勇气，在同学中的形象有所改观。

天长日久，贝尔的聪明才智，他在数学和文学上所表现的特殊才能，使大家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孩子刮目相看了。他渐渐地和一些聪明的学生中间结

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并且逐渐成了具有支配作用的中心人物。也许是因为他们共同生活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小小的年纪就显得老成而有抱负。他们共同阅读了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书籍，热烈地讨论着大人们讨论的话题。

在中心学校的第二年，贝尔就取得了学校的文学一等奖，绘画上也获得了优异成绩。在此后的每个学期里，他都获得数学一等奖，多次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学金。连那个从来就瞧不上他的父亲，也不时地夸奖起儿子的聪明才智。

1799年，亨利·贝尔的名字被列在了那些准备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名单之首。10月30日，他离开了格勒诺布尔去巴黎求学。法国首都巴黎，座落在美丽的塞纳河畔，是法国第一大城市。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使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名城誉满世界。自然，她也是年轻的亨利·贝尔所热烈向往的地方。

可是，贝尔来到巴黎，是真的想进入综合工科学校读书，走一条求学之路吗？非也。他心里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在贝尔看来，数学只是一种工具，是离开他那个讨厌的家庭，离开格勒诺布尔的工具。现在他有了巴黎，也就不再需要数学了。他不再需要数学来作为反抗父亲的武器了。到巴黎以后，他压根就没有进考场，去参加那个十拿九稳的考试。不过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魂不守舍地在街上漫步。碰上一个书店，就进去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凯拉瓦的《喜剧的艺术》，回到房间专心地读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文学。

1799年，这个新世纪的前夜，对这个只身来闯巴黎的外省青年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他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事做。从格勒诺布尔带来的钱眼看要用光了。他父亲在巴黎倒是有个贵族亲戚。他的堂兄皮埃尔·达禄还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爱将。可是他并不想求助于他们。一天，他在泥泞阴雨的巴黎街上漫步时，忽然感到自己在发烧，回到寓所就病倒了。他患的是严重的胸膜炎。幸亏达禄家及时了解到他的境遇，把贝尔接到家中养病，才使他大难不死。不过，这次他病得的确不轻，整整三个星期，他一直处在危险期，常常神志不清。到了1800年1月，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敢与命运挑战的年轻人终于重新下床走路了。然而他却无法知道，他将要走的是一条多么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

## 龙骑兵少尉

贝尔在一场大病康复之后，就在达碌家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家的主人翁是诺埃尔·达碌，贝尔父亲的表兄弟。这个六十岁的老人过去是法国南部的一个部门的长官，在政府里担任过高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皮埃尔·达碌，这个堂兄比他大十五岁，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拿破仑手下的一个陆军部高级军官；一个是马夏尔·达碌，这个二十二岁年轻英俊的纨绔子弟，有着一总是用轻率的口吻谈论最严肃的话题的巴黎人的习惯。

在达碌家，贝尔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达碌老人为了他轻率放弃了投考巴黎最大的科技学府而严厉地训斥了他，而他还不得不每天和他们一起用餐，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如芒在背。终于有一天，达碌这个“可怕的老人”把贝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我的儿子已在陆军部他的手下给你安排了一个职务。”贝尔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从此，贝尔就成了拿破仑旗帜下的一员。他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根据皮埃尔·达碌的指令起草文件和信件，完成后交给达碌签名。那是一段极其紧张而忙碌的时间。因为当时拿破仑正在为第二次征战意大利而进行着紧张秘密的准备。当时的拿破仑，正在走向政治上的鼎盛时期。雾月政变得手以后，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对国内，他迅速着手推行行政改革，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但他心头真正担心的，却是威胁着共和国安全的外部危险。当时，奥地利、英国、俄国、西西里和土耳其已经组成了第二次反法大同盟。拿破仑把出征的第一个目标定在了意大利。

一度被法国从奥地利人手中解放的意大利，已被苏沃洛夫所率领的俄罗斯军队所占领。后来，俄罗斯又把统治权让给了奥地利。奥地利在意大利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拿破仑这次征战的对手是奥地利的名将梅拉斯。这位奥军司令官错误地认为拿破仑进军决不会从瑞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大圣伯纳德山口，因此没有在那里严密设防，铸成大错。拿破仑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恰恰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拿破仑在组织军队与梅拉斯进行正面作战的同时，亲自率领一支强大的预备军团，秘密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直捣敌人的后方基地。梅拉斯的大军虽然在热那亚取得了全胜，但法军占领了米兰，后院起火使取得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只好回师迎击北来的法军。1800年6月14日，法奥军队在马伦哥平原进行决战。法国以劣势的兵力与奥军交战，抵御了奥军的进攻，并出色地组织了步、骑、炮三兵种的联合反攻，摧垮了奥军的士气。奥军惊慌失措，纷纷夺路过河，人马乱成一团。亨利·贝尔参加了这场举世闻名的战役，当时他是预备军团第六骑兵师的龙骑兵少尉，随着大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但他没能到第一线去参加战斗，上司把这一介书生安排在后勤部门工作。

马伦哥战役的硝烟渐渐散去，意大利又一次被法国人所征服。贝尔随着胜利的大军进驻了米兰。从此，这位未来的大文学家和这座美丽的意大利城市结下了不解的缘份。以至他死后的墓碑上都被镌刻上“米兰人”的字样。

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的包厢里，亨利·贝尔第一次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拿破仑。那是一次欢庆胜利的聚会。他伴随他的堂兄、上司皮埃尔·达碌来给拿破仑送报告，幸运地进入了拿破仑的包厢。他看到剧院里成千上万的人如潮般地向拿破仑欢呼。

十七岁的贝尔，被米兰的美景深深地陶醉了。宽阔平整的街道，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这一切都使这个法兰西小伙子惊讶不已。他在米兰还参观了米兰大教堂、圣马丽亚教堂、布雷拉宫等杰出的建筑，并为意大利杰出的文化艺术发出由衷的赞叹。德尔·格雷齐修道院收藏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布雷拉宫琳琅满目的油画长廊，都给了他受益终身的文化熏陶。特别是斯卡拉剧院，这座意大利音乐的神殿，是贝尔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光顾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卡拉剧院，使得年轻的亨利·贝尔成为终身的音乐爱好者。

贝尔在米兰开始学习意大利文，并且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文字。初次的意大利之行，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国土。正如他在写给妹妹波莉娜的信中所说的，他发现他所希求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他在这里如饥似渴的阅读了《荷马史诗》，还有维吉尔、贺拉斯、拉辛、莫里哀、布瓦洛等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作品。

后来贝尔经人推荐，离开了第六骑兵师，到总参谋部当了一名副官，在米肖将军手下工作，充当随从。米肖将军对他颇为赏识，派他执行各种任务。干了八个月以后，1801年9月，他又接到命令，要求他仍然回到驻扎在皮埃蒙特的第六龙骑兵师去就职。执行这一道命令他并不乐意，然而军令如山，所以他只好匆匆地与他所热爱的米兰告别了。

## 马赛之恋

1802年到1805年期间，贝尔在巴黎。他喜爱戏剧，并且象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心想当个演员。于是他经常到剧院看戏，并结识了不少的演员。其中有一位叫梅拉妮·吉尔贝的年轻女演员引起了贝尔的注意。她有一张端庄的希腊人的脸，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和使她显得格外迷人的忧郁气质。那年她二十五岁，比贝尔大三岁。身材显得有些瘦弱，但却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年轻的贝尔很快坠落了情网，开始追求梅拉尼。每次看完戏后，他都护送梅拉妮回她的住处，并且渐渐对她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感情。梅拉妮也感到这个小伙子诚实厚道，经常同他探讨戏剧表演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梅拉妮是个事业心和独立性极强的女孩子。她告诉贝尔，在巴黎这个人才云集的地方，她目前只能担任一些小角色。为了能更快地进步，她打算和马赛那样的外省大城市的剧院签订合同，这样可以出演更重要的角色。贝尔看到梅拉妮能将自己从不示人的计划告诉自己，并征求他的意见，内心感到十分甜蜜。他有些陶醉地对我的朋友说：“在这些日子里……我爱上了爱情。”

后来，在一次深谈中，贝尔第一次了解了梅拉妮悲惨的身世。她出身在诺曼底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当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就被一个邪恶的亲戚所引诱，带着一个私生女离开了家。她带着心灵的创痛来到巴黎，决心在戏剧艺术上干出成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梅拉妮的遭遇，激起了善良的贝尔深切同情和爱怜。他雄心勃勃地要创作一个剧本，为梅拉妮专门设立一个角色，改变她的命运。

那一段时光，对他们来说是无比快乐的。贝尔读的书多，知识面广，常常口若悬河高谈阔论。可是他又担心梅拉妮感到厌烦。有一次他提议说：“让我们选择一种秘密的记号，当我使你厌烦时使用它。”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梅拉妮的赞同。双方商定这个暗号为一句问话：“今晚歌剧院有舞会吗？”

对梅拉妮感情的加深，使得贝尔变得敏感而又妒忌，有时会出现晴转阴的“天气”。有一次到梅拉妮小姐那里拜访时，看到还有些其他朋友在，梅拉妮正与一个叫布朗的绅士谈话，而且没完没了。于是他就故意地表现出对布朗的讨厌和不尊重。贝尔的无礼举动同时引起了梅拉妮的愤怒。两人不欢而散。过了三四天，贝尔象没事似的挟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再次拜访梅拉妮小姐时，却一连几次吃了闭门羹。即使在剧院碰面时，梅拉妮也只是冷淡地向他打个招呼。那几天晚上，贝尔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感到并且害怕梅拉妮小姐要与他中断来往。他深为那天无礼的举动而惭愧和懊悔。

然而梅拉妮小姐无意与贝尔这个可爱而又鲁莽的小伙子断绝来往。他们很快又和好如初了。她温和地对贝尔说：“你很有才智，你会大有前途，你有极大的热情和一颗极其伟大的心灵。但是，你必须在嘲笑中运用更多的策略。你有时太尖刻了。”作为恋人，梅拉妮对贝尔了解和把握惊人的准确。贝尔心悦诚服，并且非常感动。他吃惊地感到梅拉妮的教养比他所认识到的还要高贵。贝尔暗暗对自己说，要象读一本书那样读她的灵魂，而且要一天比一天读得好。

贝尔对梅拉妮的依恋与日俱增。他必须设法与她确立某种关系。一天，贝尔去看望她，发现她的神情很忧郁，一问，才知道她的存款已经不够了。她不想再在巴黎消极地等待，她想应马赛一家剧院的邀请，签订一份由她担任女主角的合同。出于对梅拉妮热恋的爱情，贝尔作出一项大胆的决定。他

宣布将放弃巴黎，陪伴梅拉妮去马赛开辟新的事业。他告诉梅拉妮，即使那个剧院的计划落空了，他也要和她一起去农村，在她所选中的随便哪个法国的角落里生活；他将和她还有她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作她女儿的父亲和老师。听了贝尔的话，梅拉妮失声痛哭，扑向贝尔，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天贝尔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藏起眼泪，她将脸避开了我，朝向窗口，她为了高兴而流泪，为了我的好心肠而哭泣。后来她要我把手帕递给她……她哭了很久。”

马赛位于法国东南部，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和第一大海港，濒临地中海。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海员乘帆船沿地中海西行，把船只停泊在了一个名叫马西利亚的小海湾里，这就是后来的马赛。马赛这个城市，也有着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1792年，马赛市的救国义勇军高唱着后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著名战歌马赛曲开进巴黎，在大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贝尔和梅拉妮在马赛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他丢掉了在军队里当副官的职位，到马赛的一个杂货铺里当伙计，每天管理帐簿，处理信件，或者在码头上清点肥皂、葡萄酒之类的货物，有时还要受老板的气。但贝尔认为，为了梅拉妮，这样做是值得的。他经常去观看梅拉妮主演的歌剧。有时他们挽着手在海滩上漫步，倾听着波涛的声音，注视着帆船轻轻地驶出海湾；有时他们登上小山顶去野餐。三十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梅拉妮孩子般在一条叫吕沃纳的小河里洗澡，她总是顽皮地用一双小手掬起河水泼洒开去。

可是这段美妙的时光持续了三个月以后，生活的阴影就开始袭击他们了。

梅拉妮的美貌和她那充满魅力的歌声，使她的身边围绕着众多的崇拜者。一些好事之徒就开始无中生有地编造谣言，这些都使年轻的贝尔感到痛苦和烦恼，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猜测和妒忌。这对情人开始出现了口角甚至争吵。有时争吵以后，梅拉妮整天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哭泣。

1805年10月，马赛港被英国舰队封锁了。商业出口停滞，经济开始萧条。贝尔就业的商店关闭了，他也就失业了。同时经济的衰退也使大剧院的观众大为减少。到第二年2月，大剧院终于倒闭了。梅拉妮比从前更会哭泣和抱怨了，贝尔的烦恼痛苦也与日俱增。这对情人的距离在增大，爱情受到了威胁。

后来，当梅拉妮宣布她将离开马赛去巴黎的时候，贝尔没有象当初在巴黎时那样抱定与她同甘共苦的信念，那样欣然与她同往。这次他对她说，他决定继续留在马赛。

1806年3月1日，贝尔送梅拉妮上马车。在动身的那一刻，他百感交集，既感到一种莫名的忧郁和悲伤，又稍稍有一种解脱和获得自由的感觉。

贝尔和梅拉妮就这样分手了。虽然后来梅拉妮曾写信请求他回到巴黎，而他却以种种借口拒绝。

1806年下半年，贝尔靠他在拿破仑手下当将军的亲戚皮埃尔·达碌伯爵又在军队中谋得了一个职位，并随军征讨德国，很快就飞黄腾达了。于是对梅拉妮的事渐渐地就不放在心上了。若干年以后，贝尔随拿破仑大军进军莫斯科时，意外地遇见了他和梅拉妮在马赛时的朋友、男高音歌唱家塔尔基妮，从他那里了解到她已经嫁给了莫斯科的一位叫巴斯科夫的地主。这时贝尔才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地怀念着梅拉妮。他急切地想找到梅拉妮，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情，他甚至还跑到当时已经是漫天大火的莫斯科城区去寻找梅拉妮

的住处。可后来才知道梅拉尼已离开莫斯科回法国去了。贝尔在执行军事任务中，也没有忘记写信告诉巴黎的朋友照顾好梅拉尼，并让她用自己在巴黎的那套房间。

进攻莫斯科是个失败的战役。贝尔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了巴黎。这时梅拉妮已先他两个星期到达了巴黎。在朋友的安排下，他们见了最后的一面。

那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夜晚。贝尔在客厅里恭候着梅拉妮，想象着六年以后与她重逢会是怎样的情景。这时，一双纤细修长的手蒙住了他的双眼，梅拉妮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她那滚烫的手掌夹住他的鬓角，捂住了耳朵。她用面颊紧紧地贴在他的头上。

他们的见面是愉快的。梅拉妮依然是那么漂亮。他聆听着她那歌唱演员的美妙的嗓子发出的声音，观赏着她面颊上两个十分熟悉的酒窝和她那娇小玲珑、象希腊雕像一样完美的身段。他急切地告诉梅拉妮，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他象发了疯一样，怀着一种克制不住的愿望，无论如何要在这燃烧着的城市找到她。他闯进一条死胡同，四周是燃烧的房屋，火星纷纷落在他的衣服上，睫毛和眉毛都被烤焦了。要不是一个叫阿尔杰米索夫的农民帮助，他恐怕已葬身火海了。梅拉妮说：“亨利，非常幸运的是，无论对您还是对我，俄罗斯都将仅仅是一种回忆。”

梅拉妮告诉贝尔，她的丈夫巴斯科夫是俄国的一个拥有一百七十六个魂灵的地主。封建的俄国，以拥有家奴的“魂灵”的多少来衡量财产的多少。她和巴斯科夫结婚后根本没有爱情。后来这个地主被当地的农民打死了。梅拉妮决不愿意充当一个俄国的地主，而她的女儿又不幸死去了。于是她毅然只身回到了巴黎。他们这次热烈的交谈其实并没有给他俩的重归于好带来任何希望。比起六年以前，他们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梅拉妮在与贝尔重温旧情的同时，也明确地告诉他，这次相会只是“说明帐目已经算清的那一页末了的最后一个数字。”

这天晚上，梅拉妮为贝尔做了一顿马赛晚餐，也是他们俩最后的晚餐。

## 重回军营

好象是生活特意为司汤达所作的安排，他年轻时的学习和实践总是交替着进行，使得他对生活的理性认识不断地加深，思想和智慧上也不断臻于成熟，这或许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幸运。

司汤达在皮埃蒙特的军营里执行卫戍任务中得了一场病，回到他的家乡格勒诺布尔休假三个月，见到了已经老态龙钟的外祖父甘尼永和已经长成一个十六岁的美女的妹妹波莉娜。随后他干脆辞了在军队的职位，于1802年春天重又来到了巴黎。他决心继续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接受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的思想，这对他的社会和人生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文学上，他对莎士比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定期跟一个爱尔兰修士学习英文。有时早晨六点就起床开始读书和研究。可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著名的作品。我们不仿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的吸收和积累的阶段。紧接着就发生了与女演员梅拉妮·吉尔贝的马赛之恋。贝尔只身回到巴黎后，又一次投身军营。他成了近卫军里的一名军需官。这时司汤达的日记已经记到了1806年10月。法国已经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已经由第一执政变成了皇帝，并且加快了远征扩张的步伐，与英奥、俄等国展开斗争。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胜利后，欧洲的第三次反法联盟崩溃，拿破仑威震全欧。1806年10月的耶拿战役，法军又把普鲁士军队打得全军覆没，从而占领了德国。就在耶拿战役胜利后不久，司汤达和他的二堂兄马夏尔·达碌一同出发到德国。在德国，他经常路过一个位于易北河畔的普鲁士小城，这个小城名叫“司汤达”，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里是法国著名史学家温克尔曼的诞生地。后来，他的那篇优秀的游记作品《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首次采用了“司汤达”这个笔名。以后的许多重要作品，包括《红与黑》在内，作者都用的是这个笔名，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叫亨利·贝尔。司汤达这座小城不仅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代表了一位世界级的法国大文豪而举世闻名。在德国，司汤达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所负责的军需工作做得很出色，不断地得到上司的提拔。他常常飞快地骑着马到处奔波，为军队筹集食物和马饲料；为伤员准备临时医院。有一次他接连三天奔波操劳，没有合眼，终于累倒在路途之中。

由于司汤达的勤奋工作，当然也有那位拿破仑的重臣皮埃尔·达碌伯爵的帮衬，他于1810年2月升任帝国的会计检查官，继而又担任了拿破仑在德国的皇家领地总管。

这段时期，是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司汤达一生中的得意阶段。军旅生涯使得这位法兰西青年变得成熟干练，同时，也使他确立了一生追随、崇拜拿破仑的政治主张和共和主义的社会理想。即使在后来身处逆境，流离他乡时，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 败走莫斯科

拿破仑称帝后，对国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国外竭力进行扩张，企图独霸全欧。在历次反法同盟中，英俄两国无疑是最强大的敌人。1812年，拿破仑把进攻的目标定在了俄国。这次侵俄战争，是拿破仑帝国走向末路的开始。在司汤达的竭力要求下，他获准又一次奔赴前线，担任了军事委员、近卫军军需参谋。他跟着拿破仑皇帝亲自率领的五十一万大军，长驱直入，向莫斯科进军。一路上经过了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和波罗季诺极为惨烈的血战，占领莫斯科时，法军只剩下了十万人。莫斯科的守军和居民都已撤走，留下的是一座空城。当天晚上，莫斯科又燃起了大火，烧了六昼夜，焚毁了不计其数的仓库、商店和住宅。法军远离国土，既无粮草又缺寒衣，大量士兵在饥寒交迫中染上疾病得不到医治而死去。而这时，俄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日益高涨，决心同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农民们组成游击队，协助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的军队，处处打击法军。到1812年12月底，法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拿破仑丢下了溃败的残军，几乎是逃跑着取道德国返回了巴黎。

司汤达经历了整个这场磨难。他在这次远征中立下了奇功。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龙骑兵护送队，口袋里装着巨大数额的卢布，深入到俄军地区，完成了采购粮食的艰巨任务，并把这些粮食分送给退败的大军。然而由于这场战争的失败，他的这一功绩也只能是一次痛苦的记忆。司汤达在撤退中和部队走散了，在俄罗斯大雪的道路上流浪了一百多天，才回到巴黎。他虽然仍在军队中任职，但他已经看到了拿破仑的统治摇摇欲坠的前兆。被法军占领的各国人民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第六次反法联盟组成并对法宣战。1813年10月，拿破仑在德意志境内的萨克逊同反法联军展开战斗。在莱比锡决战中，与法同盟的萨克逊军队在战场倒戈，使法军惨败，退出了萨克逊。莱比锡战役失败后，拿破仑帝国内部陷入了分崩离析和众叛亲离的境地，而联军则穷追不舍，长驱直入，终于在1814年3月31日进入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禁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司汤达的命运，是和拿破仑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正像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的：“1814年4月我和拿破仑一起下台了……”

## 烧炭党人的朋友

拿破仑退位后，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回到了巴黎。司汤达痛切地感到“象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再有别的。”因此，他离开了巴黎前住意大利米兰，客居七年之久。他在这里读书、旅行、写作、欣赏意大利的音乐美术和追求爱情。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祖国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

当时的意大利，仍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之下。一批爱国志士正在为意大利的自由和解放进行着艰苦的斗争。起初他们是一群在亚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丛山峻岭中伐薪烧炭的工人们组成。白天烧炭，晚上就接待来自各地的流亡者、被放逐者和起义者。因此被称作“烧炭党”。他们的革命活动目的在于组织和吸引受压迫、有怨气的广大的意大利民众，通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建立意大利共和制度。他们不仅在“根据地”深山密林里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力量，而且在大城市，在统治者的上层和军队中也安插自己人。后来，烧炭党组织迅速发展，由它所领导的“从蛮夷的统治下解放意大利”的斗争席卷了整个意大利。

司汤达对烧炭党人的斗争非常同情和支持。他来到意大利以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米兰，但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1817年，他出版了《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这部旅行随笔。这不仅是一部描写意大利自然景色、名胜古迹的游记，还是一部真实生动的社会政治见闻录，具有鲜明的批判特色。司汤达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奥地利统治者和反动教会。他揭露奥地利国王每年仅向米兰一城就榨取三百万巨款，讽刺奥地利警察当局败不堪，贿赂成风。对在异国统治者卵翼下的意大利封建贵族阶级和上流社会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旅游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不记追叙拿破仑在1800年到1814年统治意大利时的建树，宣扬拿破仑的深远影响和人民怀念拿破仑的情形。这部作品出版后影响很大。法国伟大诗人歌德赞扬作者“文笔生动，流畅自如”。还说这本书只读一遍是不够的。这部作品，第一次使用了“司汤达”这一笔名。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得知《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作者司汤达就是他在意大利结识的好朋友亨利·贝尔时，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司汤达写一热情洋溢的信。然而，这部作品在奥地利统治者那里，其影响就完全是另一个方面的了。这个旅行随笔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它宣布为禁书，并到处寻捕其作者司汤达。

司汤达在米兰化名阿里戈·贝尔。他白天无忧无虑地读书、写作、听音乐、进行社交活动，晚上则仿佛过着另一种生活。他经常在自己的寓所秘密地接待烧炭党人。米兰的烧炭党领袖人物之一孔法隆耶里就是司汤达的好朋友。司汤达把意大利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烧炭党人也把他视作他们队伍中的一员。司汤达在旅行到都灵时，曾以工程师多梅尼科·维斯马拉的化名进行革命活动，参与策划了武装起义。这位曾经转战欧洲的拿破仑手下的老兵，也常常直言不讳地向烧炭党组织直陈己见，指出他们的斗争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和误区。他曾经在一次烧炭党人的聚会中指出他们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广大的工人、农民对革命活动的支持。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必须赶走站在从梅尔坎蒂到拉·斯卡拉的广场上的奥地利龙骑兵的夹道队列，并把某个米兰商人选为省长送进圣马加里塔去接替奥地利人。问

题在于，无论是在都灵，还是在米兰，没有一个工人理解你们的运动。我去过都灵的一家工厂，那里安静得象坟墓一样。奥地利人甚至没有往那儿派纠察队。”虽然烧炭党人对他的观点不能接受，但司汤达是在进忠言，这一点大家心里明白的。

当时，奥地利当局对烧炭党人的活动非常惧怕。认为“不久后整个意大利老百姓会到处造反。”所以他们加紧了对烧炭党人的搜捕和镇压。他们甚至把宗教组织耶稣会变成自己的鹰犬，秘密地刺探烧炭党人的活动。米兰的主教萨尔活蒂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奥地利特务头子。他们还对作为烧炭党人根据地的深山密林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不许人们给烧炭党人送食物，企图把所有的烧炭党人都饿死。有的百姓出城时，身上被搜出一块面包，就在城门附近被当场枪毙。所以当时的烧炭党人几乎都改名换姓，联络时多靠记忆而不诉诸纸笔，对叛徒格杀勿论。

1821年间，由于革命力量与统治者力量的悬殊，以及烧炭党人自身的弱点，都灵的起义失败了，米兰的烧炭党组织也被严重破坏。包括孔法隆耶里在内的大批烧炭党人都遭到了逮捕。许多人壮烈牺牲。孔法隆耶里被判处绞刑，后来又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在当局疯狂地搜捕烧炭党人的时候，司汤达也遇到了极大的危险。幸亏他的外国侨民身份和惯于使用化名进行活动，才得以涉险过关。

在那次例行的检查中，奥地利检察官看了司汤达的证件，惊叹道。“啊，您是法国人！在当前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外国人留在米兰实在太危险了。”他限定司汤达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米兰。同时，这位检察官还向这位法国人打听司汤达男爵和一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的情况，因为他们正在四处搜捕这个人。其实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而且近在眼前，就是这位持法国护照的亨利·贝尔。不过司汤达毕竟是经过战争场面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应付了这次检查。处境如此险恶，司汤达不能再在这个国家呆下去了。第二天早晨五点，他坐上驿车，带着难以名状的忧伤和失落的心情离开了米兰。

就在司汤达与奥地利检查官机智周旋以后的一个星期，特务头子萨尔活蒂正在为没有抓住那个叫维斯马拉的工程师而伤透脑筋。他虽然不知道这位神出鬼没的工程师就是法国公民亨利·贝尔，但他相信只有亨利·贝尔能够提供有关维斯马拉的情况。可是当他知道亨利·贝尔已经被驱逐出境以后，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奥地利当局为搜捕司汤达下了一道通缉令：

立即逮捕法国公民、原军事委员会专员亨利·贝尔，并要求他供出那个化名多梅尼科·维斯马拉，去过都灵的工程师的所在地点。维斯马拉曾利用一些伪造的护照在半岛的许多城市居留过，并用司汤达男爵的笔名写了一些被维也纳当局所查禁的书。鉴于维斯马拉这个自由派分子与烧炭党小组之间的危险联系，兹命令在取得法国公民贝尔的口供与多梅尼科·维斯马拉对质后将维斯马拉处以绞刑，当即报告执行情况。因为此项遵照首相梅特涅公爵的意见而作出的判决已于1821年6月22日经奥地利神圣国王陛下核准。

但此时奥地利当局对司汤达已经望尘莫及。司汤达安全地回到了巴黎。

## 结交拜伦

1816年的秋季，法国大文豪司汤达与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意大利相识。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贝尔正和几位朋友在米兰斯卡拉剧院的包厢里看戏。这时一位黑头发、大眼睛、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当人们听说他就是才华横溢、誉满全欧洲的诗人拜伦时，立刻肃然起敬。贝尔虽然没有象其他人那样表现出热烈的情绪，但对拜伦的大名，他是早已熟知，并且由衷敬佩的。

拜伦比贝尔小五岁，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一类文人。他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他兴趣广泛，博闻强记，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刻》。两年后又写出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英国具有消极浪漫主义倾向的“湖畔派”诗人。1809年大学毕业后，在英国上议院获得了世袭的议员职位。接着，他广游欧洲大陆，1811年回国，翌年开始发表轰动全欧洲的长诗《哈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时年二十四岁。当他的脚步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他正在写作游记的第三章。

贝尔虽年长拜伦，但他们相识时，拜伦少年英俊，誉满天下气宇轩昂，贝尔只是一个文坛无名、失意的流亡者，所以在拜伦面前，不免有些自卑和拘谨。由此两人之间还出现过一次小小的误会。有一次，贝尔与拜伦一道从剧院出来，拜伦不想乘马车，想步行回寓所，但路又不熟，就向贝尔问路。贝尔感到让他一人走夜路不安全，同时他注意到拜伦有点跛脚的残疾，就竭力建议他叫一辆马车。话刚讲完，他立刻感到后悔了。要知道，跛脚这一先天的生理缺陷，是诗人最感痛苦，也最为敏感的。小时候的拜伦，怎么看都是标致的美男子。然而每当他走在街上时，老是听到有人这么说：“啊，多漂亮的孩子啊，可惜脚跛了。”这话总使他痛苦万分。如今贝尔无意之中触碰了诗人的痛处，悔之不及。只见拜伦高高的昂起头，用一种优雅的风度说，我并没有打听路途是否疲劳或危险，或应该乘什么车去，我只是打听方向。

当然这段小小的插曲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拜伦了解到贝尔曾经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军官，担任过要职，还参加过进攻莫斯科的战事时，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于是，拿破仑就成了他们交谈的共同话题。贝尔真诚地向拜伦介绍他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的感受，讲他参加战争的经历。虽然贝尔是拿破仑的追随者，而拜伦却象英国大多数人一样对拿破仑抱有成见，但他们的谈话依然是热烈而诚恳的。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竟会面交谈了十一次之多。贝尔在谈话中，显得热情奔放，而拜伦则是一座喷射思想的火山，双方都感到受益匪浅。贝尔后来在回忆中说这些谈话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谈话”。

然而正如贝尔自己所觉察到的，他和拜伦彼此之间从不可能过于接近。因为他们俩的生活经历悬殊太大了。拜伦少年得志，可说是一帆风顺，而贝尔却怀才不遇，半生坎坷。由于拜伦出身贵族，因而“显然缺乏真正的人生经历，并且他的高傲、他的地位、他的名声使他不能平等待人”。而这种贵族意识，是贝尔所最不能够接受的。贝尔的观察没有错，拜伦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他总是企图将一个英国贵族和伟大的诗人集于一身。在一次聚会中，拜伦叙述着在本国受到的压抑和排谤，在场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他出